

“入穴探虎 扬名显亲”

——从致刘符诚书信中所见之晚年陆徵祥(上)

张新鹰

陆徵祥(1871—1949),曾名陆增祥,字子兴,或子欣,上海人;幼年随父信仰基督新教;12岁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文,19岁考入京师同文馆;光绪十八年(1892)任驻俄、德、奥、荷四国钦使许景澄^①译员,随许驻俄国圣彼得堡;1906年任驻荷公使;1911年任驻俄公使;1911年10月改信天主教。辛亥革命后,1912年—1920年,历任北洋政府多届内阁的外交总长,并先后两次任国务总理和袁世凯称帝期间的国务卿。1915年与日本谈判所谓“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激起“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陆徵祥都是当时中国政府的首席代表。1922年,陆徵祥任驻瑞士公使。1926年,他的比利时籍妻子培德·博斐(Berthe Bovy)去世,他即辞去公职,于1927年5月陪送灵柩赴比利时下葬。1927年7月,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Bruges)城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以56岁之年,开始了修士的生活;1935年6月晋升为司铎(神父);1946年6月,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任命他为比利时刚城(Gand,今译根特)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陆徵祥病逝于布



鲁日,享年78岁。

从中国政坛和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位显赫人物,到只身隐居异域的一名修士,陆徵祥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变化幅度不可谓不大。对于天主教会来讲,曾是中国政界要员的陆徵祥弃俗发愿以余生侍奉天主,是一件很给教会增光添彩的事情;陆徵祥的神修历程及其典型含义至今仍被不少教会史学家津津乐道。对于梵蒂冈而言,陆徵祥的特殊身份,客观上为教廷在做有关中国的文章时增加了某种可资利用的条件,例如他1946年6月被任命为圣伯铎禄修道院荣誉院长一事,按照台湾

辅仁大学原校长罗光总主教在《陆徵祥传》一书中的说法,获选荣誉院长名衔者良少,“仅于少数奇特之士,罗马教宗显其重视之心,乃任之为荣誉院长”^②;而与同时期任命田耕莘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位枢机(1945年12月)、宣布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1946年4月)、宣布建立驻华公使馆及任命黎培理(Abp. Antonio Riberi)为首任公使(1946年7月)、颁令将29位1900年死于中国的中外教士和教徒列为真福品(1946年10月)等^③二战刚刚结束后教廷对中国一系列不比寻常的举措一起观察,陆徵

祥的荣升确非孤立和偶然。但是,对于陆徵祥自己,他投身修会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大意义究竟是什么?了解这个问题对准确评价这位历史人物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能够给思考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却好像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和挖掘。笔者不是研究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专家,不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只是早在1988年曾与孙庆芳先生合作,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未发表过的陆徵祥写给密友刘符诚的亲笔信中选出16通,披露于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33辑。^⑨近日,笔者再次浏览这批书信的全部原件,又受到新的触动,殊觉信中所反映出的陆徵祥其人其事有助于加深对上述几个问题的探讨和认知,学界有必要重视这些原始资料的存在,不应任其湮没。本文之撰即缘此而来。

陆徵祥从圣安德修院写给刘符诚的这批私人书信共200余通,自1936年1月17日始,1948年11月18日终,时间跨陆徵祥65岁至去世前夕的整个晚年。书信被收信者粘帖装订为两大册,编为“利”、“贞”两号,可见原来前面还有“元”、“亨”两册,应是1936年以前的通信,可惜因沧桑变化,已不知去向,令人扼腕。册中衬纸偶有空白,似有已贴上的信件后来又收信者取下;个别信件文字被挖除,应是1949年以后收信者自感政治形势的压力而为^⑩;这些做法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尽管如此,这批书信仍然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主要原因在于刘符诚是陆徵祥“一生最亲近的四友”之一(其余3人是颜惠庆、曹汝霖、顾维钧),^⑪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刘符诚(1881—?),字荇忱,号黼斋,青年时与陆相识于荷兰海牙,民国初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继与陆结为异姓兄弟,^⑫后曾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南京政府财政部派驻中法工商银行中方董事,并经陆领洗入天主教。从书信中可以看出,陆徵祥和刘符诚的私谊极为深厚,刘是陆在修院的主要经济资助人,对陆有求必应;陆始终称刘

万方数据

为“弟”,而自称“小兄”。1937年7月1日陆在信中感叹:“小兄出世之前,惟有先室一人,入院之后,惟遇我弟一人矣。”1947年2月24日信中说:“回想入院以来,足足廿年,所得于老弟之帮助者不胜枚举,盖弟能为我谋,且所谋为我计,周且尽矣。老弟成全我者,非过言也。”陆、刘交情之笃,从他们通信的频密程度也可以得到证明,除二战中因邮路中断而有一段时间的停顿外,陆对刘几乎是每信立复,有时甚至一天两封,前言未尽,后信随之。在信里,陆徵祥与刘符诚无所不谈,感慨往事,评论时局,常有“不可为外人道也”之语。由于两人的关系如此密切,应当认为,陆徵祥在信中述及的思想、史事是比较真实可靠的,鸿爪雪泥,弥足珍贵,颇可供后人对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和日常活动做一番勾勒。

那么,透过这些书信,人们究竟能够看到一个怎样的陆徵祥呢?

陆致刘的很多信件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前,在信中,陆徵祥表现出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与国内某些抱持“抗战必亡论”的悲观主义者完全不同,他坚决主张抗战到底,“死中求生”。由此,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在中国遭受外敌入侵之际时刻关切着祖国命运、对中国必胜充满信心的陆徵祥。

1937年8月8日信:

“中日战事,早晚难免,早发晚发,在我被动地位,固无所计较,早发早了,晚发晚了,终以死中求生,不以幸免求生。死尸如山岭,血流若江河,牺牲愈多,人格愈高,民族存亡,在此一举。”

1937年8月17日信:

“小兄在院十年之中,常以不得国内消息为幸事,盖每得远东电讯,非灾即乱,非祸即变,非内讧即外患,奈何奈何!虽然,我人在世,日在苦斗中,不能因此而取消积极态度,反可增益我人之所不能。故此次严重国难,大足奋发我全国抵抗之决心,坚持到底,在死中求一条

活路,天不亡中国,终有最后之胜利。存亡固在此关头,复兴亦在此一举。我人完全相信中央执政诸公,决一死守,日人自取灭亡之期当不远矣!”

1937年8月23日信:

“日方实力虽充足,我方有宁死不降之正气,终得最后胜利也。”

1938年12月6日信:

“承示敌方民族之变迁,诚然以吾陈旧之手段,应付进化之兵器,势难制胜,亦系确论,然师出无名,古有明诫,众怒难犯,史证不爽,虽有坚甲利兵,尚须正其名而得世界同情,谓之王师,庶几近矣;反之,惟有自取败亡耳。”

陆徵祥虽然远离国内战场,但并未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而是运用自己的影响,以基督徒的身份,积极向外国各界宣传中国的抗战,尽其所能地为祖国利益服务。1939年初,南京主教于斌到欧美争取舆论对中国的支持,专程到比利时拜访陆徵祥,商议由陆主编《益世报海外通讯》。《益世报》是中国天主教界办的中文报纸,原在天津出版,“七七事变”后因报道抗日消息而被迫停刊,1938年12月刚在昆明复刊。陆徵祥旋即担起了该报《海外通讯》主编之责,并用“木兰”的笔名为妇女栏目撰稿,呼吁欧洲妇女关心和帮助中国。^⑨这使人想起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陆徵祥即用法文发表《以天主教教义看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一文,文中说:“凡是背叛真理的人,迟早要受真理报复。所以我把关于这回流血的侵略及不道德的占领满洲,以公教道理,宣示世界,俾握政权者醒悟占领人之土地,将来亦必受真理的责难。”^⑩他身居修院,却一直以向世人昭示中国遭受侵略的真相为急务。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承担主编《益世报海外通讯》后,收到刘符诚资助的一笔宣传费,他回信说:

“老弟慨助宣传费二千比币,心感难以言喻!值此抗战进入第二阶段,最后胜利不远之际,似宜稍尽棉力,加紧宣传。购致刊物及邮费为数颇巨,目下得此巨款,足够本年度用费,深

盼战事年内结束。”(1939年4月10日信)

他还对刘符诚说:

“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际,凡能尽一分心力,惟有放弃一切个人计划而毅然全力以赴之一法耳。……目前我辈人格之自植自励,宜效法三代以上之人物。盖三代以上之人不好名,而我辈亦应不好名,而但求尽心尽力,但求我心之所安,我力之所及,如是已耳。”(1939年5月16日信)

在同一时期给罗光的信中,他也说道:“值此世界出轨,人心浮动,非有三代以上人物挺身而出,不足与言治国平天下。”^⑪此时,紧随日本后尘承认了伪“满洲国”并要求“满洲国”天主教友“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的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病逝不久,庇护十二世刚刚致信伪满“皇帝”溥仪通报自己继位。^⑫陆徵祥的言行,与他们的为虎作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上述那篇1932年的文章中,陆徵祥曾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号召人民反对德国侵占的比利时天主教枢机主教梅西爱(Mercier)的话:“基督的宗教把爱国著为律令,没有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不是纯粹的爱国志士。”他自己乃是在用行动努力印证着这句掷地有声的言语。

陆徵祥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他的爱国反侵略言行,不仅仅是一个海外游子民族情感的自然表现,作为一个半生与中国屈辱的外交史纠缠在一起的前外交总长,这尤应视作他对长久以来胸中块垒的一种倾吐。在给刘符诚的信中,陆徵祥表露了从日本的侵华战争而生发出的某些历史反思。由此,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在重重蓄积的愤懑和愧疚中渴望有一天一洗国家和个人耻辱的陆徵祥。

1937年8月8日信:

“前清末叶之污败积习,非以民众鲜血不够洗涤。民国肇始之封建思想,非此千年奇祸不够改变。病入骨髓,非用猛药不够医治。……非有天翻地覆之凶灾,仇敌杀人火焚之惨暴,不够策励。小兄不以此战事为祸端,认为救星,全在我人之利用、之善用耳。叨在至好,

又是知己，用敢直陈，以罄四十余年之积愆云尔。”

1937年12月29日信：

“我国遭此奇祸异灾，相伯老人⁽¹²⁾当有预觉而先知。致⁽¹³⁾小兄方面，以自身的经历，此笔贻误国事之大帐，早晚总要清算。贻误国事，前清老臣既不能辞其咎，民国要人复不克卸其责，全国民众终不能完全委诸领袖人物之肩膀上，而不自认其贪懒自弃之一部分的责任。值此清算总帐之日，尚有不觉悟之辈，背国助敌，为虎作伥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小兄于此笔大帐上欠负不轻，于前清帐上、民国帐上、国民份子帐上，都有重大的欠缺。既承竹篔先师之训练指导，复许先室以残身献事上主，借以作补赎工夫，减轻我一身对世界、对祖国、对民众之罪恶帐目，迄今思之，实出上主宠召之恩。小兄目蒿时艰，更感主恩于无穷期矣！惟此笔血帐何日算清结束，尚难逆料，惟主命是听耳。”

1937年12月30

日信：

“前日匆匆肃上寸笺，贻误国事总算帐，可为我弟告，不可为外人道也。前人种因，我人收果，难于逃避，古今中外，同出一辙，言之痛心。……每晨祈主佑庇祖国不出半世纪变成一灿烂光辉的新中国，以慰忠魂耳。”

1938年2月14

日信：

“前信所说‘祸国殃民’的总算帐，四十年前竹篔先师的过虑，今固实现，可叹可惊。先师面嘱

密密的预备总算帐时合用应付的人材，小兄自荷兰到北京，又到森都，又到熊城，无处无时，莫不用心预备此项人材。除外交部内各同仁外，到一使馆，必留用熟手，凡有学生之来见者，莫不注意探询课程及其志向。民国廿七年来，直到总算帐时，在对外方面，大致尚无贻误陨越之处。外交界内的公使，十之七八尚系预备计划内的人。我弟虽离外交，确系计划内的一份子，现为国计民生效劳，总算帐时的确合用人材。聊以自慰。可为弟告，不可为外人道也。倘军事、财政、交通、司法、教育种种方面，都有预备工作及人材，今日局面，当不致如是失败涂地。”

从信中可知，陆徵祥耿耿于怀的“总算帐”，原是许景澄根据清末外患日深但保守势力依然抱残守缺、不思变革的状况而提出的观点。陆徵祥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视为“总算帐”时刻的到来，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日

本军国主义的全面入侵标志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近代开始遭受外侮以来最危险的关头，事态发展到这般地步，从中国自己这一方说，应该认识到是近百年间国内诸多积弊的总暴露。亡国在即，凡我国人，特别是当权者，理应幡然猛省，总结教训，洗心革面，“从我做起”，方能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侵华战争是唤醒中国全国上下振衰起弊、除旧布新的最后机会；“总算帐”之谓，实乃宣示这一机会是被迫以何等惨烈之血火代价而换得，中国如不能浴火重生，则只能

能忍自安 知足常樂

陆徵祥老弟

留行

如兄
陸徵祥書贈

廿九年七月

1946年陆赠刘符诚对联

万劫不复。另一层含义,是反映出这场战争促使陆徵祥产生了把自己政治外交生涯中的得失向国人做进一步交代的愿望。对于国家、民众,陆徵祥有深深的欠负感。陆徵祥曾向罗光回忆道:“马关条约后,许钦使大声叹息,谓我说:‘你总不可忘记马关,你日后要收复失地,洗尽国耻。’中国人善忘,马关一事早被人忘了,我则遵师嘱常记着马关。做外交总长时,请林琴南先生写‘不忘记’三字,下注马关二字,挂在办公室里。”^[4]但是,他在任时期,不仅无法做到“洗尽国耻”,反而和国家一起一再蒙受新的屈辱。1915年代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虽然拒绝签字但仍未争回山东主权,是他不得不吞咽下去的刻骨铭心的耻辱,也给他精神上带来了于国于民的沉重负担。这种欠负感和“弱国无外交”的无力感,实际上是陆徵祥从巴黎和会之后就自动逐渐离开了外交政坛中心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最终出家隐居的逻辑起点之一。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对前半生的耻辱都和对日外交紧密相连的陆徵祥,无疑是重新揭开了心头的伤口。因此,他在前面的书信中情不自禁地向刘符诚坦陈积愆,不讳言自己的“欠负”和“罪恶”,并且披露了自己在任驻外使节和执掌外交部时秘密预备“总算帐”时救国之材的做法,其视野虽然尚嫌狭窄,但还是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评价。(待续)

注释:

(1) 许景澄(1845—1900),字竹笈,清出使大臣,1898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1900年7月以弹劾利用义和团的权臣、反对向列强开战而被慈禧太后处斩,年底追复原官,1909年追谥“文肃”。

(2) 见罗光:《陆徵祥传》,《罗光全书》第27册,495页,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

(3) 参见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512—513页。

(4) 题为《陆徵祥致刘符诚书信选》,北京

出版社,1988年版,132—150页。但其中个别地方或有讹误,如134页“1937年3月1日”函中“[荷]之国”3字即为《文史资料选编》编者错加。据笔者所见,甘肃张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石建国先生在其专著《陆征祥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论文《论陆徵祥与顾维钧》(见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98—416页)中对这16通书信有所引证,作者并对陆徵祥晚年的爱国情怀给予高度评价。但其认为陆是主张“宗教救国论”,笔者觉得还可商榷。

(5) 本文引用信件中如遇被挖损处,以“□”表示。

(6) 见罗光前揭书,522页。

(7) 陆致刘1947年6月17日信:“既识荆于海牙,复同部于北平,继结为异姓兄弟,幸何如是,乐何如是!”

(8) 见罗光前揭书,457—458页。

(9) 《本笃会士陆徵祥最近言论集》,北平,传信书局,1936年版,第4页。

(10) 见罗光:《牧庐文集(二)》附《陆徵祥神父信札》1939年2月15日信,《罗光全书》第31册,437页。

(11) 参见顾卫民前揭书,504—505页。耐人寻味的是,在给同为天主教徒的刘符诚的信中,陆徵祥作为神父,对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逝世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位无一语提及。

(12) 马相伯(1840—1939),中国教育家、天主教学者,创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呼吁团结抗战。193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陆徵祥以之为师,终生执弟子礼。

(13) 原文如此,应为“至”。

(14) 罗光:《拜访兴老日记》(1939年7月29日),转引自《陆徵祥传》,《罗光全书》第27册,368页。

“入穴探虎扬名显亲”——从致刘符诚书信中所见之晚年陆徵祥 (上)

作者: [张新鹰](#)
作者单位:
刊名: [世界宗教文化](#) PKU CSSCI
英文刊名: [THE RELIGI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
年, 卷(期): 2005, "" (3)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罗光](#) [陆徵祥传](#) 1996
2. [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2003
3. [陆徵祥致刘符诚书信选](#) 1988
4. [石建国](#) [陆征祥传](#) 1999
5. [论陆徵祥与顾维钧](#) 1988
6. [金光耀](#)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2001
7. [本笃会士陆徵祥最近言论集](#) 1936
8. [罗光](#) [牧庐文集\(二\)附《陆徵祥神父信札》1939年2月15日信, 第31册罗光全书](#)
9. [罗光](#) [拜访兴老日记](#)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_jwh20050300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2e6f74a-02d4-4c36-a7af-9e4d007748c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